

朱湘新诗中的民族神话意象研究

李蒙蒙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意识的现代诗人朱湘,在其新诗创作中选用了大量的民族神话意象;同时,他注重将复杂的象征内涵与强烈的启蒙精神熔铸于意象建构中,借“古事”传达其讽喻现实、呼唤英雄与追求解放的现代理念。就审美层面而言,民族神话意象以其本身的超越性、非理性和原始性特质,为朱湘诗歌增添了灵动之美、韵味之美与拙朴之美;其在彰显朱湘诗歌古典美学风格的同时,也丰富了现代新诗的意象体系与创作技法。

[关键词]朱湘诗歌;民族神话意象;现代理念;审美功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8)05-0101-06

Study on the National Mythological Images in Zhu Xiang's New Poetry

LI Mengme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Zhu Xiang, a modern poet with strong traditional culture awareness, has used a large number of national mythological images in his new poems, and he has focused on integrating the complex symbolic meaning and a strong enlightenment spirit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images, and expressed his modern concept of satirizing the reality, calling for heroes and pursuing liberation through the “ancient events”. In terms of the aesthetic level, the national mythological images, with their own features of transcendence, irrationality and originality, have added the beauty of spirituality, charm and simplicity to Zhu Xiang's poems. The national mythological images have highlighted the classical aesthetic style of Zhu Xiang's poems, and enriched the image system and creative techniques of the modern new poetry.

Key words: Zhu Xiang's poems; national mythological images; modern concept; aesthetic function

神话是原始初民面对各种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时,以想象性的方式对其做出解答和对抗的故事。作为一种集体创造、世代相传的产物,神话是一个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宇宙观念、审美观念的集中反映,与“民族内在的精神气质相贯通”^[1]。同时,神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构成和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中国本无“神话”一词,这一概念于19世纪末从日本传入,自1903年蒋观云

发表中国第一篇神话学论文《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以来,神话学研究才成为“五四”时期蔚然成风的研究潮流。“在人类的原初时期,神话传说是文学的主要样式。后来这些原始神话、意象以隐喻的方式存在于文学作品中”^[2],神话意象也逐渐成为新诗创作中的独特审美意象类型,对于弘扬民族文化特色和复兴古典美学风格产生了重要作用。朱湘在其新诗创作中选用了大量的民族神话意象,为

收稿日期:2018-05-22

基金项目: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科研项目“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典型现象研究”(231-20205170431-420)

作者简介:李蒙蒙(1990-),女,山西运城人,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其诗歌文本增添了一定的现实意义与审美效果。学界目前对朱湘新诗中的民族神话意象关注较少,研究成果主要呈现于刘长华的博士论文《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民族性的建构之研究》^[3]中,论文在第六章“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主要作家的个性实践”中对朱湘新诗中的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所蕴含的启蒙之思、文化民族主义倾向与“优美”之感作了具体剖析,具有一定的前瞻意义。总体而言,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探讨新诗与传统关系的热潮之下,对朱湘新诗中的民族神话意象进行系统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 朱湘的传统文化观与神话观

朱湘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皈依与服膺主要体现在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与接受上。朱湘幼年时期于蒙馆和乡塾中接受过系统的中国文学传统教育,在清华学习期间也一直注重对古典文学的学习。在留美期间,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盛与西方民族的傲慢,朱湘的民族自尊心逐渐高涨,他决计复兴中国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力图“证明我们不是一个退化野蛮的民族”^{[4]199}。首先,朱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宝藏,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起点,任何脱离文化基础的全盘西化只能是昧于历史的“无本之木”。朱湘在实践路径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复古”的关键在于翻译和考古两方面。其次,朱湘将“复古”意志与民族振兴的爱国理想紧密结合。中国灿烂辉煌的古典文化中蕴含着崇高的理想与极端的美丽和自由,是中华民族强盛历史的表征,他希望通过复兴传统文化来唤起一种崭新的民族精神。他以叙事诗描述国民精神面相,激发民族斗志,并鼓励友人“为了祖国过去的光荣,拼了命写”^{[4]223}。再次,朱湘的文化观念不是那种狭隘的民族复古主义,而是具有广阔的“文化大观”性质。他提出的“复古而获今,迎外而亦获今之中”的文化理念具有强烈的现代性。他提出在“中学为体”的基础上做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西为中用,既不盲目复古,也不完全排斥先进文化,而是在创造性的继承与借鉴中,“创造一个表里都是‘中国’的新文化”^{[4]171}。

中国民族神话作为华夏民族早期历史文化的反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民族精神的重要凝聚,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因此重现民族神话的神性魅力是暗含于朱湘复兴传统文化

的理想之中的。朱湘的神话观集中体现在其散文、书信与评论性文章中。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朱湘对于民族神话故事了然于胸。散文《空中楼阁》充分显示了朱湘对神话典故的熟悉与喜爱程度。他在文中将玉皇、王母、共工、女娲、齐天大圣、仙女、月宫、玉兔、牛郎等几十个神话典故串联起来,并配以妙趣横生的评议,体现出他丰厚的神话知识储备。《日与月的神话》一文也体现出朱湘对古典神话深入细致的研究态度,如其对“金乌”“日起扶桑,日落若木”等的考察与解释。难能可贵的是,朱湘对神话概念有着非常清醒的理性认识。他在《异域文学》中提出,《山海经》和《镜花缘》里“关于异域人的神怪、荒诞的传说,完全是在‘行路难’的时代初民运用了他们的丰富的想象以及恐惧的动机所创作而出的”^{[4]281},这一判断是基本符合科学规律的。其次,朱湘在创作中重新发现了民族神话的魅力,并充分认识到其作为文学创作的原材料的可能性。在《日与月的神话》中朱湘向友人诉说:“近来作了几首英文诗,是取材自我国的神话,作时猛然悟出这些神话是极其美丽。”^{[4]33}这一叙述可以视作朱湘以民族神话入诗的创作实践的佐证,也表明了朱湘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的欣赏和认知。朱湘在看到顾颉刚《古史辨》中关于神话人物禹的论述时,表示“从前虽在《努力》看见过,如今看来,更觉有味”^{[4]185},也反映出其对民族神话的认识随着时代、人生与创作追求的变化而不断深化。朱湘曾在散文《文以载道》中将“载神道文学”定义为表现原质力的,与初期的宗教、迷信有密切关系的文学,认为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神话题材文学应当隶属于这一范畴。最后,朱湘对于西方神话的接受是潜隐于诗歌创作中的,他虽表示“决不肯在诗中引入异种的材料的”^{[4]189},但在运用西方诗体或尝试写作英文诗时,他对西方神话的运用却是颇为自觉和自如的。

通过对朱湘的三本诗集及遗著《永言集》的考察,发现朱湘诗歌中至少有50首诗中运用了神话意象,其中民族神话意象占绝大部分。同时,其一些诗篇中虽然出现了诸如女神、耶和华等西方神话和宗教意象,但基本上并未独立成篇,而是与中国古典神话意象并置而用,形成了丰富的内涵与张力,反映出开放的文化理念。朱湘诗歌中的神话意象在整体上可以分为六大种类:一是创世、起源与始祖神话意象。朱湘在诗歌中借用了共工、女娲、

燧人氏、后羿、日神、羲和、地母、春神、巨灵、神农、三苗、尧、舜、禹等人类始祖或文化英雄意象,以及月亮神话、太阳神话、洪水神话意象等,这些神话意象的运用强化了诗歌文本的时空感,将一种开天辟地、万物伊始的宏大气象引入审美层面,同时也蕴含着文化寻根和民族强盛的意味。二是图腾、神兽与天体意象。凤凰、雏龙、麒麟、夜泉、天狗、鸾等图腾和神兽意象蕴含着传统文化意味和民间审美趣味,具有文化原型的意味。其中龙、凤意象在朱湘诗中所占比例较高,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存在。天河、星宿、天狼、彗星、北斗、天孙、银河、天河、虹桥等天体意象则寄托着诗人浪漫的宇宙观念。三是仙界神话意象。仙界意象寄托着诗人对神仙世界及其生活场景的想象,同时与人间世界的惨淡悲苦形成对照,朱湘诗歌中的仙女、玉瓶、龙女、太白金星、玉皇、王母、张果老、托塔天王等仙人形象,以及瑶林、昆仑山、阆苑、凌霄宝殿、仙境、天庭、龙宫等空间意象无不异彩纷呈。其中被频繁使用的是牛郎、织女与嫦娥意象,以及由此衍生的素娥、水晶宫、月姊、月宫、白兔、桂花、吴刚、天河、月里孤嫖等系列意象,它们共同折射出诗人高洁的人格与纯美的理想追求。四是冥界传说意象。这类意象在朱湘诗歌中出现的频率较高,主要包括阴司、阴曹、冥国、地狱、鬼门关、奈河、十殿、黄泉路等环境意象,钟馗、疫神、死神、阎罗、鬼差、魑魅、鬼影、僵尸、女魅、男妖女怪、冥灵等鬼怪意象,以及收魂、还魂、勾魂、阴魂、三魂七魄、投胎、来生等观念性意象。这类意象的营构一方面表达了诗人对英雄、友人逝去的缅怀之情和对英雄重生、国魂重振的期待与呼唤,如《哭孙中山》和《招魂辞》等篇什;另一方面传达了诗人的生死观与生命体验,如《阴差阳错》一诗。五是宗教传说意象。这类意象主要是佛教传说意象,如观音、杨枝甘露、布袋和尚、卧佛、八百罗汉、四眼罗汉、四金刚等,其主要集中于《尼语》和《八百罗汉》两首诗中。这些意象褪去了以往的神圣崇高色彩,或成为诗人埋怨的对象,或沦为坐享其成、外强中干、盲目自大的滑稽形象,蕴含着诗人的解构意识。道教传说意象也是朱湘诗歌中重要的宗教传说意象,其主要是朱湘诗歌中的白鹤、九华山、三山、碧落的意象,以及骑鲸、徐福东渡、秦始皇寻药、缩地、飞升、神仙辟谷等涉及游仙、方术的意象。六是西方神话与宗教意象。西方神话意象包括美神、女神、夜神、阿拉、天使、战

神、阿里代等神祇意象,普罗米修斯、赫丘利等英雄意象,智鸟、乐园、长乐岛、厄琉西等自然意象,以及耶稣、信徒、基督、耶和華、撒旦、开闾等《圣经》意象,这些意象集中于朱湘《十四行意体》《致埃斯库罗斯》两首诗中。

二 朱湘新诗中民族神话意象的象征内涵

朱湘对民族神话意象的借用与描摹不是为了返回历史语境,而是注重阐发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现实内涵与精神导向,其通过对古典神话意象的再解读,寄寓了讽喻现实、呼唤英雄与追求解放的时代理念,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所应憎与爱,乃至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5]的书写旨归。

(一) 对黑暗现实的隐喻与讽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动荡不堪的时期,列强的欺侮、军阀的混战和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丑恶、横暴与虚伪遍布祖国大地,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中。作为爱国诗人,朱湘将复杂的时代语境与强烈的启蒙精神融于非理性的神话意象中,使“这些原本承载着原始人类心理经验的神话原型在中国现代作家的笔下却充满了现实性与革命性,有的甚至还蒙上了政治的色彩”^[6],神话意象成为诗人或隐或显地讽喻现实、批判国民性的有效武器。在《哭孙中山》一诗中,“哭罢!让我们未亡者的哭声/应答着郊野中战鬼的哀音/哭罢!因为镇鬼的钟馗已丧/在昆仑山下魑魅更要横行”,诗人运用战鬼、钟馗、魑魅三个冥界意象分别指涉革命烈士、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国内外反动派,用写鬼状异的手法积极介入现实,表达了对革命英雄逝去的悲恸,对革命前景的绝望与担忧,以及对一切反动力量的痛恨。《寄思潜》一诗中诗人以仙界意象天公来喻指世道,以图腾意象凤凰来指代英才形象,以“为什么日月为两目的天公这样昏蒙”和“雅雀高翔而凤凰卑伏”的诗句,将批判矛头直指黑白颠倒的不公世道对人才的埋没与摧残,以此寄寓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控诉与批判。民族神话意象在此强化了诗篇的情绪感染力,并与屈原《天问》的文本形式及精神指向形成遥远呼应。《猫诰》与《八百罗汉》两首诗集中呈现了朱湘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猫诰》是一篇充满谐趣色彩的叙事诗,诗人在老猫的训示中,掺入尧、舜征伐三苗的神话故事、智慧女神与智鸟的西方神话意象,以及关于神农的意象,将

沉浸在往日辉煌中的妄自尊大、自恃高贵的老猫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使其成为自我膨胀、不思进取的弱国子民的代言人,实现了针砭国民痼疾的创作旨归。《八百罗汉》中佛教传说意象、神仙意象以及耶和華意象交融并置,将平日只知坐享其成、毫无危机意识,受到外来侵犯时互相推诿、毫无责任感的罗汉形象刻画得绘声绘色,此处的罗汉意象与金刚意象均是对中国子民的巧妙隐喻。总之,为服务影射时政和批判国民性的主题要求,诗人所选用的神话意象主要是冥界传说意象、古史传说意象、仙界意象、佛教传说意象,其主要目的在于和现世的人事之间建立关联,形成强烈的现实指涉意味,从而传达诗人忧国忧民的时代理念与价值诉求,因而诗歌的整体情绪基调是沉郁顿挫和忧戚感伤的。在朱湘看来,“王维固然同杜甫一样好,但在当今时势之下杜甫实在更重要”^{[4]183}。

(二)对英雄和新生的期待与呼唤

民族神话意象作为民族的原始心理与精神本质的凝结物,具有鲁迅所言的“鼓荡人心”的作用,尤其是英雄和创世神话意象本身所蕴含的原始蛮强的生命力量、昂扬拼搏的精神状态与集体主义的道德品格,对于重振国魂、激活民众创造力、挽救民族危亡具有重要意义。朱湘在留学期间曾明确表示:“华族如今的退化无庸讳言,但并非天生的不能。我回国后决计复活起古代的理想,人格,文化,与美丽,要极端的自由,极端的寻根究底。”^{[4]186}民族神话意象的营构是朱湘实现其复活理想的重要途径之一。为配合这一主题需要,在神话意象的撷取方面,诗人主要选用了招魂意象和创世英雄意象,因而文本节奏随之加快,情绪格调也变得昂扬激越。正如郭沫若在其诗歌中以凤凰涅槃来隐喻中国的新生,这一主题在朱湘的诗作中主要表现为招魂与复活模式。朱湘将灵魂不灭、生死轮回的观念熔铸到具体意象中,借以传达英雄不死、民族复兴的爱国理念与信心。《招魂辞》共分为8节,每一节都重复着“招魂”的主题。诗人以鬼怪、冥界、投胎、魂魄等意象为组构,召唤着为国献身的英勇烈士的再次复活,并在最后以骏马送国士归来的美好愿景作结,传达了诗人对拯救家国的英雄形象的赞美与祈盼之情。《关外来的风》中,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诗人发出“黄花岗上/葬有鬼雄/黄种儿孙/浩气漫空”的鼓召。诗人以黄花岗烈士这一“鬼雄”意象为载体,号召人们秉承英雄的精神与遗志,

抵御列强侵略,维护国家与民族的统一。在《哭孙中山》一诗中,“停住哭!停住四百兆的悲伤/看哪:倒下的旗已经又高涨/看哪:救主耶稣走出了坟墓,华夏之魂已到复活的辰光!”诗人以耶稣意象指称孙中山先生,以耶稣的复活喻示民族之魂的复活,从而振奋国民精神,将希望与理想投注到革命进程中。同时,在呼唤激情与力量的时代背景下,起源神话意象与始祖意象因其包孕的原始生命活力与创造能量而成为诗人热衷的文学元素。在《祷日》中,朱湘以燧人氏、女娲、共工、后羿等意象为民族的精神指引,发出“黑暗/永无希望再光华的黑暗/怎能为做过灿烂之梦的/我们这族裔所甘心”的反抗之声,并在结尾处以羲和与天狗这一组对抗性意象弘扬民族战斗激情与民族自豪感:“如其是天狗……那就教羲和/惊起四万万铜烧,战退/那光明之敌。”除此之外,诗人也擅长对其他民族神话原型进行现代性重塑,赋予其充满时代活力的新内涵。在《热情》一诗中,朱湘一反隽永优美的诗风,将反抗力量与创造热情挥扬到极致,以月宫、吴刚、天狗、天河、牛郎、织女等意象和太阳神话原型的创造性重构,放任主体上下求索,毁灭无爱的地球,消融月宫的冰冻,扫除丑恶势力,照亮一切黑暗,“一吐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却也能引起热血青年的共鸣遐想。”^[7]

(三)对幻美世界的追求与怅惘

如果说前两个主题体现了朱湘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是“大我”对时代战斗旋律的应和,那么这一主题则更多地蕴含了“个人的解放”意味,体现了朱湘对爱、自由与美的追寻,是其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的体现。以朱湘的《泛海》与《洋》为例,两首诗均作于1927年朱湘赴美留学的海上去程中。其时,面对新奇壮观的大海和即将开展的新生活,诗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泛海》中“我要拿大海为家/月灯放花/碧落为营幕/流苏缀星宿/绡帐前龙女拨琵琶/酗酒高呼/任天风播入无涯”,以碧落、星宿与龙女的意象组合为大海增添了无穷的梦幻感,体现了诗人的想象力、审美情趣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在《洋》中诗人的思绪攀升至璀璨的天国、太古的神灵和人生的奥秘,以共工、女娲的民族神话意象赋予海洋以沧桑的历史感与幽深的神秘感,体现了诗人开阔的生命意识与丰富的生命情怀,是其创作中少有的明朗雄奇之作。这样的生命热力同样可见于《恳求》一诗中:“马缨在夏夜喷吐

芬芳/那浓郁有如渍汗的肌香/连月姊都心痒/女郎呀,你看她疾翔/向情人疾翔/谁料你还不如月里孤孀。”诗人借“解放自我”的月姊意象,来劝说身边羞涩的女郎冲破社会与自我的封锁,大胆地自由恋爱,这种炽热的主体情感与独立的精神姿态是五四时期的典型特征。在国难当头、生存受限的处境中,朱湘常借助民族神话意象来构筑一个梦幻逍遥的神仙世界,打破主体的种种限制,放任其在三界之间自如神游,这样既彰显了诗人高洁纯净的精神特质,又与逼仄窘迫的现实境况形成鲜明对照,进而生成了另一重隐喻意义。朱湘的《月游》是典型的“神游体”或“梦游体”诗作,诗歌起笔不凡,“我骑着流星/度过虹桥与天河/向月宫走近/想瞧不老的嫦娥”。接着借助桂树、兔子、宫女、吴刚的意象描绘了月宫中清幽安谧的生活环境和无忧无虑的仙人形象,待终于见到圣洁的嫦娥仙子后,“我”呈上从海中、山中、地上所搜集的珍奇礼物,与她亲切交谈,接受她回赠的礼物,并坐着象牙雕的车返回故乡,如此幻美自由之仙境,如此高雅圣洁之人仙交往,皆令人沉醉。但是诗人却在结尾处以“我的车翻了!滑进了瀑流中间!我忽然惊醒,月光恰落在床前”将思绪拉回到现实中,从而突显出神话世界的虚幻性和现实世界的不可超越性。全诗的结构与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具有相似性。

三 朱湘新诗中的民族神话意象的审美功能

民族神话意象以其本身的超越性、非理性和原始性特质,为朱湘诗歌增添了灵动之美、韵味之美与拙朴之美,从而在整体上提升了诗歌的艺术境界。同时民族神话意象入诗,既弘扬了诗歌的传统美学风格,又丰富了现代诗学的内涵,为新诗审美品格的发掘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一) 奇幻飞动的审美效果的生成

民族神话意象具有强烈的时空延展力、想象色彩与虚幻性。民族神话意象入诗,往往可以打破主体的局限性与时空的限制性,赋予主体一种向上超拔的力量和积极浪漫的审美心态,使其从平庸的生命与逼仄的现实中逃离出来,并借助极度夸张奇幻的想象,打通古今,沟通三界,建构人神同体的理想模式,使人成为独具力量与异禀的特殊存在,也使作品获得奇异灵幻的神秘色彩。如朱湘在现实主义诗歌文本中加入幽冥空间意象,将关于超验世界的想象引入诗歌的言说空间中,为其诗作增添了怪

诞与非理性之感。又如诗人在描摹牛郎、织女与嫦娥意象时,侧重于展现人性与神性的互动,这样既扩大了诗歌的想象空间,为其诗作增添了幻美与超验之感,又体现了诗人高洁唯美的诗性情怀。神仙世界中的动植物意象和空间意象,如苍龙、凤凰、丹桂、水晶宫、龙宫等意象的运用与组合,构建了流光溢彩的神话之境,将一种华美光辉的仙界图景描摹出来,反衬了现实世界的污浊与黑暗。同时,民族神话意象之间的串联与组合具有很大的跳跃性,诗人往往不以逻辑规则为依据,而是遵循神话思维的规律,恣意纵横,随意勾连,强化了文本奇幻诡谲的整体语境。总之,神话意象的营构是一次复魅的过程,它强化了诗歌的审美效果与超验性,有利于诗歌文本意蕴的升腾,是诗人对浪漫主义风格的积极探索,也是其生命情怀的映照。需要注意的是,朱湘在运用民族神话意象时并非纯粹为了打造一个避世的桃源,而是将奇幻书写与现实旨归自觉融合,既追求文本玄妙空灵的意蕴空间,又注重挖掘其现实内涵,追求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综合,从总体上营构一种虚实相济的艺术世界。

(二) 含蓄蕴藉的美学品格的生发

民族神话意象本身的象征性与隐喻性造成了诗歌意蕴的丰富性。民族神话意象本身包含着丰富的情节性,是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生活与精神状态的映现,具有文化意义上的自足和完整性。同时民族神话意象在作者的加工之下,也蕴含着现代思想内涵与主体的生命感兴。在这三重意义的叠加之下,民族神话意象变成了富有趣味的象征符号,深化了文本的文化性、思想性与情感性。民族神话意象入诗,拓宽了诗歌的表达空间与自由度,增加了文本的厚度与纵深感,在整体上张扬着一种虚实相生、蕴藉多义的审美境界,从而扫除了早期白话诗浅显平白、缺乏诗意的弊病,带给读者新鲜多维的阅读感受。在《哭孙中山》一诗中,钟馗这一神话意象的使用,为诗歌注入了民间文化的意绪与活力,使故事获得了全新的言说空间。同时钟馗意象蕴含着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是黑暗污浊的时代环境下崇高的革命领袖形象的象征。钟馗意象也承载着诗人对反动派的愤懑与对革命者的崇敬之情,具有鲜明的情感指向性,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民族神话意象的模糊性和非理性使得诗歌具有虚实相济、真幻相生的特征,形成了朦胧混沌的文本空间,造成了诗歌的蕴藉性和多义性,从而

与过于平面和写实的诗风拉开了距离,成为昏暗无光的时代背景下独具异彩的特殊存在。神话意象的熔铸,使得朱湘诗歌具有强烈的开放性和表现力,从而为读者造设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丰富了读者非理性的阅读体验。

(三)拙朴典雅的民族风格的形成

民族神话意象蕴含着一个民族基本的价值观念、精神气质与诗性智慧,同时也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内涵与古典审美韵味,其合理运用能使诗歌在审美诉求方面呈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与民族底蕴。其一,民族神话意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始初民的生命强力与朴素真挚的生命情怀,充满了健康自然的鲜活之感,是一种不加雕饰的审美凝结体,其所蕴含的“审美意识相对较为质朴、凝练,从而也更为本原、开放”^[8]。因此,民族神话意象入诗,为诗歌增添了原始拙朴的粗犷之美与雄强之音,是朴素自然的民族风格的显现。其二,民族神话意象呈现出淡远超然的宏大境界与典雅含蓄的诗性品格。“上古神话留给诗歌的宝贵财富正是这种‘天人合一’所形成的和谐浑融、超越悠远的艺术境界。”^[9]朱湘诗歌中的民族神话意象的使用,往往使诗歌的审美意境得以飞升,将读者引入圣洁超凡的神话氛围中,同时也使主体高远的生命理想得以呈现。这种和谐俊逸的审美情怀与表达方式是对传统美学风格的复归。其三,在与西方神话意象的对比中,更能体现出中国神话意象的民族风格。朱湘诗歌中的西方宗教神话意象与英雄神话意象烘托出的是崇高的情怀与凝重肃穆的氛围,其在某种程度上与东方民族文化之间具有一种阻隔感。而其诗歌中中国古典神话的运用则显得更为贴切和丰裕,能为文本营造出更多的妙趣与神韵,同时彰显出和谐圆融的民族审美风格。其四,在民族危机深重的背景之下,朱湘以民族神话意象入诗、复兴

民族美学风格的行为,不仅是对传统诗学品格和文化内涵的皈依,更是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彰显,这一追求也使得朱湘的诗歌在众多苍白无力的诗作中脱颖而出,并自成风格。

总之,民族神话意象入诗是朱湘对现代新诗写作的独特发现,也是其复兴传统文化魅力的自觉实践。朱湘的诗歌创作,通过对古典神话意象的现代内涵的挖掘,既传达了诗人的爱国情怀与个人理想,又丰富了新诗的古典意象体系和审美内涵,实现了现代理念与传统美学韵味的有效融合。

参考文献:

- [1] 谢逸骏. 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393.
- [2] 李红绿.《九歌》中的原型意象及其英译:以许渊冲和卓振英先生的译本为例[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3(2):111.
- [3] 刘长华. 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民族性的建构之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
- [4] 朱 湘. 朱湘文集[M]. 北京:线装书局,2009.
- [5] 茅 盾. 茅盾全集:第2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3.
- [5] 吴新平. 中国现代神话题材文学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文学院,2013:.
- [7] 方 铭.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评析 现代诗歌[M].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161.
- [8] 王怀义. 图像与意象:神话美学研究的逻辑旨路[J]. 民族艺术,2013(1):108.
- [9] 李 利. 追寻诗歌中的神话印记:中国上古神话与诗歌艺术境界[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5,31(5):56.

责任编辑:黄声波